

理论动态 284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

1981年6月20日

认真学习理论，自觉清理 “左”的思想

我校本期学员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认真读书的基础上，着重清理“左”的思想，总结经验教训，加深了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理解，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现选登四位同志的学习小结。

我很有清理“左”的思想影响的必要

一部组干班学员 燕庆嵒
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通过第一单元的学习，在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联系实际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界限中，一方面使我们看到了建国三十一年来，我国建立了比较巩固的社会主义经济，初步改善了人民生活，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逐步完善着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就；另一方面也使我们认识到二十多年来存在着“左”的错误，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严重挫折。“左”的错误是全局性的。这首先和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当时党中央指导方针的偏差分不开；但同时也和我们许多干部的思想认识和实际行动分不开。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的：“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般说来，在干部中‘左’的东西，只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没有有无之分。”

就我个人来说，对于“左”的种种错误，除了在“文化革命”中有一定程度的不太通以外，都曾经是一个积极的执行者。这里我讲讲在自己身上的“左”的错误影响的主要表现形式。

第一，欢迎“左”的东西。自己的思想，常常为一些不切实际的、冒进的指标和宣传所鼓动，欢欣鼓舞地去迎接“左”。比如，对“三面红旗”，我当时是一个真心实意的拥护者，听说要超英赶

美等等，自己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于是在出差期间，放下原来肩负的工作任务，自动上山“大办钢铁”，夜以继日，流汗淋雨，结果却一无所获，干出了劳民伤财的蠢事。当时，听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城乡都要实行供给制，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也是积极赞同，并按照这种要求，写信给在农村的父母，动员他们做好思想准备，大家一起过平均主义的供给制生活。结果老人们跑到机关来质问我，是不是儿子不养活父母，将来让他们去敬老院！这些现在看起来是笑话的事情，当时却当成是革命，而且觉得党员、干部要带头。这就说明了彭德怀同志批评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存在。

第二，多次反对过所谓的右。什么是所谓的右？过去，把不搞“穷过渡”、“大冒进”说成是右，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也看作是右。对于生产完不成高指标的，对于搞政治运动抓不出坏人或抓不够规定比例的，都斥之为右倾。实际上，是把实事求是当成了右。当我们了解情况、评论干部的时候，大家总是希望能够实事求是。然而，自己却往往说这一个“政治不挂帅”，那一个“见物不见人”，归之为右倾。而且当着将一些坚持实事求是的同志，甚至把一些只是“左”得不太厉害的同志作为右倾来批判的时候，自己又成为斗争中的“左”的一份力量。

第三，搞运动先“左”起来再说。在工作上，习惯于大哄大嗡。特别是搞运动，比如搞“四清”、“社教”，总是大工作队、大动员、大揭发、大批判，更是把大哄大嗡作为一条经验。认为不如此不能打开局面，而在打开局面以前是不能怕“左”的。这么搞的结果，往往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按“左”的政策处理一些人，这在当时看来，是运动的“成绩”；第二种，即使按“左”的政策，

也看到错斗了一些人，又说是搞的结果，弄清了你没有问题，也是运动的“成绩”。总之，是先“左”起来有理。

总之，二十多年来，自己在“左”的指导方针下工作和生活，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有许多“左”的表现。但是由于农民小生产出身的阶级局限性，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自然科学知识准备太差，因而往往把错误当成正确，把左倾当成革命，从而就在“左”的基础上，发挥着自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积极性越高，错误就越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损害就越大。

在我们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清理“左”的影响的时候，很自然地联系了毛主席、党中央，这是有道理的。但我们说毛主席有错误，不是要否定毛主席，而是实事求是地把毛主席看成是人不是神，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但也有错误，需要认真分析，以吸取教训。我们说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也是在肯定党的伟大的前提下，认识错误，以便改正错误，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同样的道理，对于自己、对于我们的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虽然不否定过去的成绩和正确的方面，但也很有清理“左”的影响的必要。如果说我们个人与制定正确的或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联系不起来，那么我们不是和在一定范围内执行正确的或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吗？对自己来说，为了保证执行三中全会制定的正确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必须认真清理“左”的影响，而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除思想僵化和半僵化状态，真正达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 克服“左”的影响

二 部 学 员 张 泽 民
云南省司法厅长、党组书记

对于清理“左”的错误影响这个问题，是逐步认识的。来校前我是不承认我还有“左”的思想影响的。自认为：“‘左’的错误思想，对我影响不大。”原因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我是左倾路线的受害者，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我有刻骨的仇恨，经受了一场大灾难；粉碎了“四人帮”，我打心眼里高兴；对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衷心拥护，坚决地贯彻执行，从未有过什么抵触情绪。不仅对文革中“左”的一套东西是这样，就是对文革以前的“左”的错误，自己也是很有感触的。例如对“大跃进”中的什么“大炼钢铁”、“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等等，以及反右扩大化等问题，都有不同看法，问题是当时不敢表露。由此，就产生了“‘左’的错误对我影响不大”的想法。

这些天来，通过对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对党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学习，哲学原理以及对有关的辅导报告的学习，对“左”的错误影响，在认识上有了新的提高。比较深刻地认识到，二十多年以来，“左”的错误影响到全党。由于经常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工作和生活，在每个同志来说，只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而没有有无之分。《理论动态》二百六十三期文章，

对这个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经过反复思考，我开始认识到，自己原来认为“左”的错误对我没有多大影响的看法，是不客观的。

认真地回顾过去，事实并不象自己来党校前所想的那样。例如，对“文化大革命”前一些“左”东西，尽管当时自己有不同的看法，还不是都跟着干了？难道“执行者都执行了”这还不是影响吗？况且，对这些“左”的东西也并没有很快的觉悟到。这些年以来，“‘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这个错误观点，在自己思想上打着很深的烙印。多少年来，自己最耽心的就是怕犯右的错误。很多问题，自己在理论上并没有弄清楚，在实际工作中基本是执行了“左”的指导方针所布置的任务。比如，在改变生产关系问题上，片面地强调“不断革命论”，忽视“革命发展阶段论”。总认为，向高一级的所有制形式过渡“越快越好”。在建设速度上，赞成“多”、赞成“快”，很少考虑全国的国情和云南的客观条件。我是做政法工作的，在阶级斗争、“专政”问题上，“左”的影响也是严重的。在办案过程中有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通过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感到更应该一一清理。而且这些东西又大多是同“左”的指导方针联系着。就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前两年，也还是执行两个“凡是”的一套东西。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自己从未清理过“左”的错误思想，总是怕犯右的错误，而忽视对左倾思潮的警惕。

通过对《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学习，懂得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谁是第一性，谁是本源的问题。进一步加深了对哲学两条基本路线，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理的理解；认识到马列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是肃清“左”的影响的理论武器。

通过学习深刻地体会到党中央要求全党认真清理“左”的错误影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建国以来，我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成绩是伟大的，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二十多年来“左”的错误造成的危害又是严重的。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清理“左”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执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当然我们应当看到，清理“左”的影响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二十多年来，“左”的错误是主体的错误，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如象我这样的人，“‘左’比右好”的错误思想，长期在脑子里起支配作用；执行了“左”的东西，往往还心安理得，受害不知害，觉悟不快，是有深刻教训的。

我决心在党校学习过程中，认真读书、思考问题，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自觉地开展自我批评，深入清理“左”的错误影响，同“左”的错误完全决裂，更好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具体分析是清“左”的好办法

三 部 学 员 韦 成 栋
广西河池地委副书记、专员

这次来党校学习，是带着问题来的，是什么问题呢？

前年冬季以来，我们地区允许农村有多种生产责任制形式的存在，不搞一刀切。于是，农村搞包产到户（含包干上交）的占总队数六成以上，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包工到组联系产量和按件记工的只占总队数的三成多。包产到户的做法在社会上震动很大，众说纷纭。有的说：“这是倒退”。有的说：“这是单干，不是责任制”。有的说：“搞的面太宽了”。有的提出“要纠，要扭”。地委也感到有些压力。我也自问：“这样搞，方向路线对吗？是否犯了右的错误？看来又冒风险了”。十年浩劫期间，被批为刘少奇代理人的场面又在我脑中泛起，“左”的阴魂，依然未散。去年春天，我就在点上把包产到户试扭一下，结果，扭不动，群众很反感，并强烈要求给搞一造；同意搞一造后，群众又要求搞一年或两、三年。当时，地委常委经过反复研究，认为不论搞那一种责任制形式，都要稳定下来，先把生产搞好，以后逐步完善提高，不能硬扭，不然会出大问题。广西区党委领导同志也支持我们这种做法。经过一年的实践，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个地区农民欢迎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的合理性，加上对三中全会以来两个农业文件特别是75号文件的学习，我们的认识大大提高了，解除了思想上的顾虑。但是，如何更好地从理论上

去回答上述一些同志提出的问题，对我来说，则还没有完全解决，在这次学习哲学原理过程中认真进行了思考。

今日农村，为什么许多农民要求包产到户？难道他们经过三十多年农村建设后要走“回头路”吗？不。“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广大农民是懂得毛主席讲的这个真理的，他们是有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过调查了解，农民所以要搞包产到户，最根本的是对左倾指导方针的抵制。二十多年来，尽管农村有很大变化和成就，但是，农民是吃尽了“左”的苦头。我长期搞农村工作，也有这个体会。

为什么说农民搞包产到户是对“左”的指导方针的抵制？这要从我们地区的实际情况谈起。

总的来说，“老、少、山、穷”是我们地区的主要特点和实际。老革命根据地，有东兰、巴马、凤山三个县和都安、南丹、天峨部分公社，共三十三个社镇，六十万人口，五十七万亩耕地，多属大石山区，生产条件极差，过去受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摧残，至今生活仍很苦。少数民族有壮、瑶、仫佬、毛难、苗、侗、水家族等，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二以上，文化科学技术落后。山区多，全地区有1284个大队，其中山区大队1007个，占83%以上。交通不便，生产条件很差，有许多地方，山路太小、太陡，运输物资只能用背篓背，不能用肩挑。穷队多，分配人均在50元以下的生产队占总队数的53%以上，有些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值才几分钱。这些大石山的群众，形象地形容他们的生产水平是两支部队：一支是“1007”部队，即一条扁担，一对簸箕，一把锄头；一支是“1111”部队，即一把月刮，一把刀，一把火，一包种子，还处在刀耕火种的状态。可见，山区人民生产条件很差，生活很苦。

但是，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们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支配下，忽视山区生产的客观条件和特点，不认识生产力水平很低这个基本事实的严重意义，盲目地强调人民公社越大越公越好，到处刮共产风，有的急于“穷过渡”，认为共产主义并不是遥远的将来。特别是，对公社的劳动组织，一律强调集体劳动，按“一拉平”办法记工分配，仿照大寨那种以政治工分进行劳动计量的办法，而把定额管理按件计酬和人民公社初期允许搞的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生产管理的好办法，指斥为修正主义。结果是，平均主义非常严重。长期以来，又不断批右，抓阶级斗争，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这就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经过二十年的奋战还没有真正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解放思想，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他们冲破了过去那一套“左”的东西，搞符合生产力水平的包产到户。可见，河池地区出现的包产到户，有它的必然性，是农民起来纠正左倾错误的表现与结果。这就有力地说明，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过去，我们对生产关系的理解是片面的，认为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就能发展生产，而忽视了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研究。从实践看，生产力是决定生产规模、决定劳动组织、决定分配形式的。因此，人民公社各种经济管理结构，如果不考虑生产力的状况，以主观愿望搞过高过急的要求，或者用一个模式到处乱套，那非碰钉子不可。

包产到户这种生产管理形式，为什么说它是符合我们地区的客观实际的呢？因为包产到户是在坚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基础上，用比较简单的分配和计酬形式来克服平均主义，这是符合我们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和群众觉悟水平状况的，同时，在劳动组织管理上，根据

居住和耕地分散、耕作落后和管理水平低的状况，用包产到劳或到户的形式，能够很好克服社员劳动往返集中和做工一窝蜂的弊病，以更好发挥社员的特长和符合千山万岭的生产特点。通过一年的实践，社员对允许搞包产到户，非常高兴，积极性很高，农活速度之快、质量之高、对科学种田的重视，是建国以来少见的。因此，去年在大旱威胁下，全地区仍获得了增产。不少有名的“三依靠”社队，如南丹县瑶寨公社等，由于增产幅度大，一年就初步翻了身。市场粮价下跌，群众生活稳定。党群关系也改善，干部下队，社员热忱相待，并大谈粮食增产由来，要求政策稳定三、五年不变。都安瑶族自治县有的群众风趣地批评我们说：“过去你们要我们记大寨工分，望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快点，结果是36码的脚穿42码的鞋，走不动啊！”

很明显，在生产不发达的地区搞包产到户，是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水平这个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不存在什么“倒退”的问题，如果把它指斥为“倒退”，那是左倾顽症的逻辑。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来观察包产到户，也不存在什么“单干”、“复辟”问题，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特定阶段下分散落后山区人民公社一种生产管理的好形式。而建立生产管理形式，既要积极引导，又要尊重群众意见，不能搞一刀切和死抠百分比。因此，对包产到户的各种指斥是错误的。当然，包产到户，有许多矛盾要解决，同时要逐步创造条件，引导农民向比较高级的专业承包联产计酬方向发展。但是，也不能因包产到户存在一些矛盾而惊慌失措，搞什么“纠偏”、“硬扭”。如果那样办，只好把农民又装进左倾顽症的口袋里去。马克思主义从来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纯而又纯的，而认为“旧社会的痕迹”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这种旧的痕迹也只能在长

期的发展中，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逐步消失。这句话，对医治左倾顽症是很有用的。

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联系实际具体分析包产到户这个事物，使我认识到，在目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学习马列主义非常重要。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客观实际事物作具体的分析，才能更好清理“左”的思想，提高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树立搞好“四化”的信心和决心。

两进党校 两次清“左”

二部学员 郭超
炮兵原副政委

1943年到1945年，我进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又一次进中央党校学习。两次进党校，都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历史经验，着重清理“左”的思想，提高执行正确路线的自觉性。通过这段学习和思考，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更加认清了“左”的指导思想，对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危害。在延安中央党校那次学习，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兼校长）、彭真同志（副校长）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学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同志们普遍认清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不清算“左”的错误，中国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这次来中央党校，在学习中也结合清理“左”的思想，但与上次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是，我们党在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后，已经成为执政的党，在取得了空前胜利之后，我们党犯了“左”的错误。这次“左”的错误，时间很长，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利用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给党和中国人民造成了一场极其令人痛心的大灾难。我们正是需要通过学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防止左倾错误的再犯，使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为建设现代化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就我个人来说，上一次进党校，才是二十

四、五岁的青年；如今已是六十岁出头，经历了不少人生的风霜。如果说那时还很幼稚、“左”的东西还较少的话，那么几十年后，“左”的东西是多了、重了起来，所以，感触是痛切和深刻得多了。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切不可再以正为右，以“左”为正，以“左”反“左”，以“左”反右了，要坚决摒弃那种“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观点，也不能从概念、感情、想象出发，而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是党的建设中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

二、两次学习，都在研究历史经验时，着重分析了当时犯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务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那次是党校第二期，正赶上康生搞的那个“抢救运动”，同志们有很大的疑虑。开始，学习了三个多月，进度是完成了，但没有敞开思想，大家又互不了解，讨论中难免无的放矢，空泛议论。后来，在校、部领导同志一再动员下，从小组、支部、各部到全校大会，“放”了三个来月，对中央和战区领导同志都可以提意见，当时叫“自由思想”，问题提出来了，大家再来分析研究。在毛主席《学习和时局》讲话的启发下，大家自觉地“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主要通过自我批评，进行思想总结，没有感到任何的压力。彭真同志评价说，这期比上一期效果好。毛主席听了很满意，并决定放假两周，暂停生产，读两本书，即鲁迅的《阿Q正传》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启发大家不要护短，不要在胜利面前居功骄傲。这是对大家的另一种形式的教育。这次来党校，党校领导再三宣布实行“四不主义”，要求切实地按照耀邦同志提出的“四个好好地”的要求，进行学习。这使我感到这正是延安整风的继承和发展。现在学习正在进行中，但我们在初步学习和重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联系实际，对建国以来，特别是1957年

以后，党的指导思想，在经济、政治、组织、思想等方面“左”的表现，进行了探讨。我们研究了党的工作着重点未能及时、坚决地实行转移的问题；分析了在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违背客观规律，在政治方面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错误；总结了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和领袖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教训，等等。正象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所说的：“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当年的延安整风是这样做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次学习虽然不是搞整风运动，但我们也是着重分析犯错误的社会的历史的根源，而不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思想，吸取教训。记得当年延安整风，我们检查了思想上的绝对化、简单化，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主要是批判了小资产阶级那种主观片面、华而不实、好走极端、偏激狭隘的劣根性。在中国社会中，小资产阶级有革命性，但是这种革命性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有本质上的不同。革命胜利后，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小资产阶级仍然象汪洋大海一样包围着我们，我党的指导思想所犯的“左”的错误，不能说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关系；而我们在具体工作中，也由于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大都是诚心诚意、毫无怀疑地执行了“左”的一套东西，我自己也不例外。但是，我们历次运动中，作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却很少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把它轻轻地放过了，对于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也未很好的进行批判。大家一作思想检查时，都是依照“基本路线”、“兴无灭资”、“斗私批修”等要求互相上纲上线，虽然帽子扣得很

多、很大，但都言不符实，并不能吸取教训，真正解决问题。这次再进党校，回顾了几十年的历史，使我清楚地看到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顽固性、危害性，是产生“左”的错误的主要的思想根源，必须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改造，才能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彻底转到无产阶级思想轨道上来。我们要自觉地学习周恩来同志那种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

三、两次学习，都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经过那次的党校学习，我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懂得了学习理论要着重领会精神实质，掌握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而不能照搬书本上的那一套，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是党、是毛主席、是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这一、两代人。这次学习，却遇到了一个关于评价毛主席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根本性问题。我认为必须坚持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多次提出的评价毛主席的原则，这就是：“在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在谈到毛主席的错误时，小平同志说：“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也是有责任的，我们至今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近来，陈云同志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也讲了很深刻、很实际的亲身感受和正确意见，着重指出，我们现在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毛主席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这是毛主席一条最大的历史功绩。小平和陈云同志都曾经身处逆难之境，但他们总是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坚强党性和很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他们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值得我们深思铭记。我还认为，有两种态度都应该防止和反对。一种是，一听到实事求是讲毛主席的错误，就反感，继续坚持“两个凡是”一类的东西。一种是，违背小平同志提出的原则，把毛主席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把他的正确的思想言论也拿来批判，这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最近，黄克诚同志发表的《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讲得非常深刻、中肯，我都表示拥护、赞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是同任何迷信、偏见不相容的，它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向前发展。我们的一切工作也都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即便是纠正毛主席晚年的错误，也要依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依靠毛主席给我们留下的极其丰富宝贵的理论武器，而不能是别的什么思想。我也深感胡耀邦同志提出领导干部要有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的要求，是十分适时、十分重要的。我们高级干部更应该做学习、宣传、实践、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模范，做增强党性、促进团结的模范，做清除“左”的思想和其他错误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我相信自己这次进党校，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理解，应该是比上一次更全面、完整、深刻得多了。

四、从我们党的历史看，我们党成立后六十年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的历程。我们党是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特别是同“左”的错误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十年后，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全党都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大胜利。但是，建国以来，

主要是1957年以后，我们却遭受了几次重大的挫折。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又一次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纠正左倾错误，使我们党又重新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了。但是，由于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我们党受到的外伤和内伤都是很严重的，要彻底清除“左”的影响，要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还需要经过全党的艰苦努力。诚如陈云同志所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抓紧搞好。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只要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严格要求，“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带头纠正不正之风，坚定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建设四化的伟大事业中不断取得胜利。这是我这次进党校，在学习和回顾历史经验过程中，认识上又一个突出的收获和体会。

（以上四篇文章原载教务办公室编印的《教学生活》）